

我所认识的吴先生

向建英

(1976~)，西南林业大学，副研究员。2001~2005年就读吴征镒院士博士研究生。

1998年，我从云南大学毕业，有幸得到学校的免试推荐名额。大学时曾在农大校友的带领下去过昆明植物所，被植物所的环境深深吸引的我对自已说：如果能保送进入植物所读研究生，我就读；如果不能，那我宁愿放弃免试名额，自己考。幸运的是，在一位师兄的引荐下，我顺利进入昆明植物所植物园读硕士，师从管开云研究员。

进入昆明植物研究所以后，我才渐渐了解了这座科研院所的魅力，除了优雅的环境，更有良好的科研氛围。“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是1938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和当时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龚自知商定成立云南农林植物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前身）时提出的所训，这也是吴征镒先生毕生追求的目标。从事植物科学研究的人，无不知道这篆刻在昆明植物研究所球场边的八个大字里蕴含的深刻含义和无尽的追求。



2002年与吴先生合影

硕士期间，昆明植物所的老师 and 师兄师姐们不时会说起关于吴先生对研究的执着，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我对这位不时在所里遇见的和蔼老人越发敬重。硕士毕业时，对分类学兴趣渐浓的我在武素功老师的影响下，报考了分类室蕨类植物学的研究方向，并有幸在武素功老师的推荐下，于2001年成为吴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由武素功老师负责具体指导。博士入学尘埃落定后，武老师和我说了好几次，要带我去面见吴先生，却迟迟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武老师觉得平时穿得太随便的我难得穿得整齐，就满意地说：“嗯，今天穿的，适合去见吴先生了！”我才知道平时看似不拘小节的武老师，对拜访吴先生还是很重视的。想到终于可以真正认识吴先生了，我高兴极了，但也忽然感到不知所措。到了吴先生的办公室，先生很和蔼地招呼我们入座。吴先生和武老师简要提出了他对我的博士论文立题的想法，吴先生谦虚地说对蕨类研究不多，但是可以从大处着手提出自己的想法供我参考。两位老先生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着对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的看法，说得我情绪高涨，同时觉得受益匪浅，心想有太多东西要学，一定要努力把博士论文做好，不辜负了老先生们的期望。讨论完论文的立题，武老师叮嘱了吴先生工作不要太累，还得注意身体，我们就与先生告辞了。初识吴先生，让我见识到了大师的风范，先生深厚的学术积淀使他对研究的思路信手拈来，同时又表现出了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

论文开题后不久，武老师又带我去见吴先生，简要汇报了论文的研究进展。吴先生鼓励我继续



努力，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把研究做好。临走时，武老师就当时植物所职工外迁之事问吴先生，说“吴先生，听说您家的房子买了？买在哪里啊？”不等吴先生回答，武老师自己又说：“我问了也是白问吧？您恐怕也没时间关心这个，不知道买在哪里吧？”，吴先生就笑了，说“是啊，我是不知道买在哪里的！”听着他们的对话，我的心里更敬佩吴先生了，心无旁骛，一心只为求学问，试问现在的科研工作者，有几个可以做到？

2007年，几位和武老师合作开展越南蕨类植物调查的越南植物学家到所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留在标本馆看几天标本，和武老师提出能不能帮忙联系，他们想拜访一下吴先生，并解释说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只是很想能亲眼见见吴先生，他们觉得能见到吴先生，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武老师觉得吴先生年事已高，事务又多，自己跟随吴先生那么多年，都觉得不好轻易去打搅，所以有些为难。虽然为难，但合作方提出来了，不去问问似乎也不合适，就让我打电话给吴老的秘书杨云珊，问能不能安排简短的会面。吴老很快就答复同意会面。我马上到标本馆陪同他们一起去拜访吴老。到了吴老的办公室，正在工作的吴老脱下眼镜，表情略显疲惫，但还是很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友好地与越南植物学家攀谈起来。吴老一开口就说：“我1964年曾经到越南考察过植物，越南的植被很好啊！我记得那时和我们一起参加考察的越南人有……（说出三个人的名字），我们重点考察了……（详细列举了考察的一些地区和山头），我对这些山头上分布的植物还有深刻的印象，比如……”他说起的这三个人，越南植物学家都知道，他们暗地里和我说：“这几个人都不在人世了。”从吴老办公室出来，越南植物学家感慨说，吴老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那么多年前的考察还记得那么清楚，我们作为植物研究者，这一生能见到吴老这样一位极不平凡又平易近人的大学者，实在是幸运之至。很惭愧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吴老说到的很多细节，但是对他这样时隔50年仍有如此清晰的记忆，我感到异常惊讶，佩服至极。想起看过的一则报道，周俊院士曾经问过吴老“记忆力怎么这么好？”，他回答说“博闻强记，不足挂齿。”吴老的勤奋和执着，永远是我们年轻一辈需要努力去学习的。

记得2003年的时候，吴老曾因病住院。病情严重至昏昏沉沉几日不清醒。武老师自己去过看望过一次，第二次答应带我一起去。去时心是揪着的，觉得很是无措。到病房听说先生已略有好转，但仍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我们去到病房时吴老处于昏睡状态，但是因为病情已逐渐好转，病房的气氛也就相对轻松了一些。我们也才知道吴老是因为使用抗生素，产生副作用，造成整个人思维不清。我们只在病房短暂停留，看吴老气色还好，放心了些，觉得不便打扰太久便离开了。回来的路上武老师和我提起，吴老这几天里有时会说胡话，说的是想不通在文革期间被身边熟悉的人批斗的事。武老师感慨说，跟随吴先生这几十年，先生几乎什么都聊，唯独从来不提在“文革”中遭受的冤屈，也从来不会因为被人批斗过而记恨任何人，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只是一心一意带领大家把科研做好。他在病中无意识说胡话提起这事，可见先生心里的委屈，但是他的心胸足够宽广，宽广得足以容得下这些人和事，再委屈也不去计较。每次想起这件事，我就很感叹先生的包容和大度，实在是不平凡！

2013年6月20日，吴先生不幸因病去世。还未能从武老师去世（武老师于同年3月9日病逝）的悲伤心情中平复的我，不得不再次面对恩师辞世的伤痛。人们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有褒有贬，但对于吴先生，从我入所到离开植物所的十几年间，听到的褒奖不胜其数，吴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宽容大度的胸怀，在荣誉和利益面前的谦让，感动了一辈又一辈的科研工作者。虽然他已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留给后人的精神力量，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转眼就是吴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了，往事如昨，我难免还会为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植物学家而倍感遗憾，自知在学术上的成就甚少而觉得愧对先生，但另一方面又一直为自己有幸成为先生的弟子，能亲耳聆听先生的教诲而深感荣幸之至。先生曾经说过也以身作则去践行的，“要做研究，先学做人”的教诲，一直是我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践行的，也一直是我会不由自主向身边的同事和学生转达的。希望吾辈年轻的植物学研究者，谨记吴老教诲，努力做一个踏实、努力，具有高尚人格的人。

